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社会学（第四辑）

Education For The Needs Of Life

密勒氏人生教育

〔美〕密勒伊尔文 (Irving E. Miller) 著 郑宗海 余子夷 编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 社会学（第四辑）

Education For The Needs Of Life

密勒氏人生教育

〔美〕密勒伊尔文（Irving E. Miller）著 郑宗海 余子夷 编译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勒氏人生教育/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社会学)

ISBN 978-7-5520-1857-8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221号

密勒氏人生教育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622号 邮编200025

电话总机021-63315900 销售热线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8.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857-8/B.206

定价: 92.00元(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棒，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2016年3月20日，于阳光新景寓所

「美」密勒伊爾文（Irving E. Miller）著 鄭宗海 餘子夷 編譯

密勒氏人生教育

中華民國十年九月初版

原序

本書作者，曾著有『思想之心理』(Psychology of Thinking)一書，流行頗廣。本書之編著，不過就彼書中之論點，推而廣之，以試用於教育之事。本書意在原理之解釋而不涉瑣細，文詞務求平易，冀足爲各級師範之教科以及教師讀書會與講習會基本教科之用書。

本書視教育爲即生活之一部分。凡有生之物，皆有需要之須滿足。凡生物苟由經驗而實在變更其行爲，其事即謂之學習(Learning)。所謂有意的(Conscious or intentional)教育者，不過對於自然的學習加以指導。有意的學習，不能取自然之原則方法而代之，不過輔助自然之運行，使其於個人之生活中容易達到其標鵠。其結果則生活需要較滿足，較豐富，且較進步也。將欲增加教育之效能，必須明：生活各種需要之爲何，兒童所以滿足此等需要之自然方法，所以能滿足此等需要之材料，以及何種人最宜於助兒童以滿足此等需要。初章既將教育之功用觀(或機能觀)敷陳其科學的根據，然後用此觀念以解釋教育經驗中各分子之性質及功用。此教育經驗中之諸分子，即所謂目的，兒童(即被

教者）教材、教法及教師是也。

本書編製上，亦有一特點，即每章皆冠以許多問題。此等問題，非備教師質問於學生者。不過使閱者於未修本文以前，即注意於本章內之重要問題。桑戴克教授以精神之傾注（act）於某事，爲學習該事項之一重要條件。深願閱者於閱各章時，先多費若干時間於此等問題也。

此書編纂時，承孟羅博士之鼓勵，得以脫稿，感荷殊深。予妻宓勒荔蘭，哥崙比亞大學師範院附設林肯學校英文教員，厲鶴南德先生，及惠州宓爾華葛市州立師範學校心理與教育學教員亨特爾生先生，對於拙稿曾爲評校，獲益匪鮮，合誌以謝。

宓勒伊爾文（Irving E. Miller）

序於紐約市，時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

譯序

本書原著之出版，在民國六年冬季。本書譯者之著手遂譯，始於八年十月，至翌年四月而已告竣，蓋距今已一載矣。人事倥傯，未獲暇以從事校讎。又始譯時，只以爲門人參證之用而已。達意果契合於本文，遣詞或難免於繁瑣。因是之故，不敢舉以問世。而南高教育科諸同學時時以出版期相詢問。去夏南高暑期學校，子夷曾以教法之一部作某科目教材之一種。一時以印本不多，無從購買，轉相鈔錄，揮汗不辭。自茲以後，西自關中，北至京師。海陬文人，外邦學士，郵函相詢者，不一而足。聞吳中某師校，已用以作教授藍本，最近則友人某君回國後教授於某高師，亦取以爲教材之一種參考，則知本書固不當違時勢之要求，再作高蹈之想矣。

本書因恐文字晦澀，故曾托

1. 杭州浙江省立女子師範學校教員朱佑生（蔚堂）先生
2. 南高附中舍監兼國文教員計寧人（誠）先生

3. 前南高教育科同事現商務印書館編輯楊英父（賢江）先生各檢閱一遍。閱後對於不明瞭處，頗有指出。楊先生並代爲點句。對於三先生，深爲感謝。如猶有不明處，則譯者之過也。

本書第五章，初稿出於子夷，係用語體。而宗海所譯他章則皆已用淺近文言。故由宗海改變子夷所譯一章爲文言。以少就多，取其便利而已。其餘諸章之遙譯，概由宗海負責。

民國十年四月

鄭宗海
俞子夷序於南京

氏密勒

人生教育目次

第一章	教育之生物學觀	一
第二章	教育之意義與目的	三七
第三章	兒童	六五
第四章	教材	一二四
第五章	教法	一五九
第六章	教師	二三〇

密勒氏

人生教育

第一章 教育之生物學觀

本章所討論之問題如下：

1. 教育何以可由生物學解釋之？
2. 一生物之顯著特徵，最足誘起吾人關係於教育之思想者何在？
3. 此等特徵亦存在於羣體否？
4. 適應之意義何在？
5. 人生適應中之重要分子爲何？
6. 求適應則教育爲必要，其故何在？
7. 如以生物學釋教育，則身心之關係與知情意之關係如何？
8. 本生物學的概念，如何發生功用 (Function) 之觀念？功用之意義及各個意義之效用若何？

滿足人生需要之教育

問題

1. 吾國以栽培物喻栽培人類處，亦頗不少，試舉數例以明之。
2. 培人與蒔花之異同處如何？試表列之。

堅冰始鑿，大地回春。有愛花之癖者，即從事於園圃。顧蒔花也，亦自有術。今試以草芍藥（原文以 Sweet peas 一種豌豆類）為例，因非吾國人經驗中所有，故改爲例，則斯時也，不得不移其宿根，散植園中；取適宜之土壤，量播種之淺深；擇地貴雨露之易沾，覆土慮霜雪之或降；始而茁焉，繼而苞焉；灌溉以時，無有疏虞；順性栽培，亦弗助長。蒔花如是，培人亦然。夫培植者，固非能自創根種，若枝葉若花蕊也，其事不過供給所栽培者以最適生長之境況，而時爲看護，以冀滿足其需要而已。推之而筦牛羊茁壯者，亦不過諳其性質，時能助之，以遂其需要而已。

夫人以言生活之基本原則，固未有異於他生物也。自生物學觀之，人不過一生活的完全單元（A living whole）或一有機體（Organism）而已。故欲睹一兒童得躋於其發達之